

北京大学校园内有一处叫勺园的
地方,位于燕园西部。

明朝万历年间,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的后裔,明代著名书画家、政治家米万钟在西郊这块低洼地上修建了一处园林,面积百亩,“溪流潏潏,湖泊连属,岗峦起伏,林木幽深”,因其水源来自于西边的湖泊海淀,故以“海淀一勺”之意,给园林起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名字“勺园”。其故址在今北京大学勺园群楼及附近一带,目前尚有池塘、曲廊、假山等,多为近现代所建。

清初,勺园旧址上建弘雅园,1793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的时候就下榻于此,因此勺园成为了外事的场所。

十分巧合的是,如今的勺园,也以食宿接待为主要功能。现隶属于北京大学会议中心,由北京大学会议中心统一管理和经营,是一处以接待外国学者、留学生为主的综合性国际交流和接待场所。

目前的勺园一共由9栋楼组成。其中的7号楼、8号楼、9号楼组成了“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

那么,“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是怎么个由来呢?

2020年10月21日上午,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拜会和采访了已退休多年,原任北京大学外国学者留学生处处长黄道林老师。

黄老师1938年出生于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工作到退休。在12年前的2012年7月12日,我和黄老师见过一次面。那时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管理委员会召开会议,正大集团方面李绍庆、谢毅、吴汉泉、马钧几位先生,还有我,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今天再见面时,看到已经82岁的黄老师还是那样的精神矍铄、健康干练,十分欣慰!

事先我给黄老师发了一个拟就的采访提纲,看来起了作用,黄老师带来了一大本他收存、保留的有关正大集团与北京大学交往的资料和照片,十分珍贵。

寒暄之后,我们坐下来,黄老师结合着他带来的资料和照片,笑容可掬、和蔼谦虚地为我们娓娓讲述了他亲身参与创建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的难忘故事。

1992年,北京大学为了适应国际交流的日益扩大和国外来北大交流的学者及留学生不断增加的实际情况,计划建造勺园7号楼、8号楼。据当时估算,总投资约为3680万元。为筹措这笔资金,校方先后与多家外国及香港的企业、学校、团体联系,商谈筹资捐款事宜,但多因对方开出的条件过高或资金不足等原因,没有谈成。

最后,北京大学经多渠道努力,为项目自动筹措了两笔启动资金。一笔来源于日本一所大学,经1992年6月的商谈,由该所大学预付留学生学费、住宿费共80万美元,与该校在7年内派来的留学生所产生的各项

燕园往事

勺海有涯情无边

——创建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的往事

·薛增一

费用相冲抵。1993年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

还有一笔,是经香港的捐赠方同意,暂借香港一家企业捐赠给北京大学作为对外教育交流基金的100万美元。北京大学与捐赠方约定,分五年由北京大学勺园管理处将这笔钱全额归还给北京大学对外教育交流基金账户。

这两笔合计180万美元的资金,按照当时约8.6的汇率计算,大概相当于1500万元人民币。

有了这两笔启动资金,1993年勺园的7号楼、8号楼就先行动工了。

但工程还面临一个大问题:后续建设资金大约2200万元还没有着落。

工程进行到一半时,后续建设资金仍未得到落实。为此,1994年8月1日北京大学基建处和勺园管理处联名向罗豪才、李安模两位副校长,以及北京大学财务处写报告,称目前仍然存在投资的缺口,缺乏建设资金的问题严重影响工程进度,在争取境外捐款无望的情况下,恳请学校尽快进行贷款或采取其他应急办法,以保证工程顺利进行。

在这之前,1994年1月,北京大学罗豪才副校长随全国政协华侨委员会考察团访问泰国期间,曾参观访问泰国正大集团曼谷总部,见到了时任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先生。罗豪才副校长向谢国民先生提出,希望正大集团能够支持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谢国民先生当即表示可以考虑。

罗豪才副校长收到这份联名报告时,他再次想到了正大集团。1994年9月19日,他提笔给正大集团永远荣誉董事长谢国民先生写了一封求助信。我听黄老师讲,当时北大方面想,能够请正大集团捐赠数十万美元,就算达到目的了。

在谢国民先生收到这封信后,正大集团经谢正民、谢大民、谢国民四位先生商议,同意帮助北京大学建设勺园7号楼、8号楼,希望学校进一步提出项目预算和捐赠合作方案。

得到这个消息,北京大学向正大集团提交了442万美元的总预算。正大集团当即同意给北京大学赞助221万美元。黄道林老师得知后喜出望外。

接下来,正大集团以陈定国先生为主,北京大学以罗豪才副校长和黄道林老师为主,双方就捐赠和合作协议的细节,进行沟通和商谈。北京大学与正大集团的友好合作,罗豪才先生是当之无愧的首倡者和主要贡献者。

1995年10月27日,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和时任正大集团资深执行



北京大学方与正大集团方商讨捐赠和合作事宜(照片从左至右为罗豪才、谢国民、闵维方、黄道林)



2000年7月,北京大学在正大国际中心举行授予谢国民先生、谢中民先生“北京大学名誉董事”和“北京大学杰出教育贡献奖”仪式

副总裁陈定国,分别代表双方正式签订了《北京大学及正大集团合作成立“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协议书》。时任正大集团总裁谢中民先生作为见证人签字。

合同约定,7号楼、8号楼总建筑面积10519平方米,建设资金由正大集团资助50%,即221万美元。中心建成后按照企业化经营方式进行管理和经营,每年盈余甲乙双方各分得50%,其中北京大学方分得的部分由校方自用用途,正大集团方分得的部分全部用于北京大学的教学、科研、改善教师和员工待遇、

设立奖学金和助学金等。也就是说,正大集团不拿走一分钱。双方还约定,在7号楼门厅外墙和接待大厅永久悬挂“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的铜牌。

双方共同成立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管理委员会,双方各委派了三位委员,指定一位为委员会联席主席。北京大学委派的三位委员分别是时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闵维方、时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迟惠生、时任北京大学外国学者和留学生处处长黄道林。正大集团委派的三位委员分别是时任正大集团资深执行副总裁、农牧企业总裁李绍庆

(秦籍),时任正大集团资深执行副总裁、总裁室主任陈定国(中国台湾籍),时任正大集团资深副总裁、财务长刘润强(中国香港籍)。闵维方先生、李绍庆先生并任联席主席。由于人员变化,2012年7月12日正大集团方面新委派了三位管理委员会委员,谢毅先生(中国北京籍,任联席主席)、吴汉泉先生(秦籍)、薛增一先生(中国安徽籍)。

黄老师介绍说,正大集团答应资助221万美元后,在双方没有任何书面约定的情况下,就按照工程需要陆续把钱全部拨付给了北京大学,确保了勺园建设工程没有停工。对正大集团的大爱、诚信,黄老师一再表示很感动。

8号楼先期建成,1995年8月开始接待留学生。1996年4月,7号楼也顺利竣工,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全面投入使用。

时间到了1996年。这一年,北京大学根据留学生规模和进一步扩大的实际需求,提出要建设勺园9号楼、10号楼。为此,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先生于11月20日写信给时任正大集团总裁谢中民先生,希望正大集团继续支持北京大学建设9号楼、10号楼,以满足留学生不断扩大的需求,同时也为1998年的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献礼。

北京大学提出的方案是,新建9号楼、10号楼,共计6500平方米,需要资金2680万元,计划从三个方面筹款:一是1996年、1997年、1998年这三年7号楼、8号楼的经营利润中属于正大集团支配的50%部分,以及这三年计提的7号楼、8号楼的折旧费,约1000万元;二是向正大集团借款1350万元,借款期限3年;三是勺园管理处从盈利中支出330万元。

11月28日,谢中民先生收到陈佳洱先生的信函及所附的9号楼、10号楼建设规划和筹款方案,立即同意,并且承诺正大集团借给北京大学的1350万元在3年借款期内全部免息。黄老师说,当时资金市场的融资利息很高,都在10%以上,正大集团的诚意和善举再次令北京大学方面十分感动。

1998年5月,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9号楼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前竣工并投入使用,成为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献礼工程之一。10号楼因北京市政府规划所限未被批准而没有开展建设。

因10号楼未被批准建设,正大集团给予北京大学的无息借款实际为1100万元,学校于二年后就如数归还了。

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时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先生率团访问印

度尼西亚,受到了谢中民先生的热情接待。谢中民先生从印度尼西亚购买了五幅珍贵的油画作品赠送给北京大学代表团。目前它们正悬挂在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

据黄老师回忆,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是当时和其后一个时期内北京大学最好的接待场所,因此很多重要的国内和国际接待活动都安排在这里,包括1998年4月江泽民主席来北京大学视察工作,2001年泰国诗琳通公主在北京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研究、学习及此后她多次来北京大学访问,2007年3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先生来北京大学访问,等等。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见证了北京大学很多的重要历史事件。

谢国民先生和谢中民先生联袂到访北大,黄老师历历在目。那是谢国民先生第一次来北京大学参观访问。

2000年7月7日,应北京大学的盛情邀请,谢国民先生、谢中民先生抵达北京大学进行访问。校方周到安排,给予正大集团两位领导人热情而隆重的欢迎。

学校在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举行仪式,授予谢国民先生、谢中民先生“北京大学名誉董事”和“北京大学杰出教育贡献奖”。时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闵维方先生主持仪式并致欢迎词,校方向谢国民先生、谢中民先生分别颁发“北京大学名誉董事”和“北京大学杰出教育贡献奖”证书,学生代表献花,谢国民先生发表致词。

两位先生出席了校方主办的纪念中泰建交25周年学术研讨会。泰国驻华大使、中国外交部亚洲司领导、谢国民先生分别致辞,部分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的有关专家、学者作学术报告、发表讲话。

活动还安排参观北京大学校园,前往赛克勒考古和艺术博物馆、生命科学学院蛋白质与植物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参观。

北京大学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窗口之一。北京大学与正大集团的合作,既是大学与企业合作的典范,也是中国和泰国两个国家友好的象征。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不仅见证了北京大学国际交流的许多重要瞬间,更成为了展示中泰一家亲的一个窗口,连接中泰感情的一条纽带,撰写了中泰友好的新篇章。它铭刻着正大集团对北京大学的支援和帮助,寄托着谢正民、谢大民、谢国民、谢国民先生四位泰籍华人对祖籍国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情怀。正大集团作为中泰两国的友好使者,秉持“利国利民利企业”的三利原则,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的教育事业,为推进中泰友谊和经济、社会交往,贡献更多的力量。

黄道林老师是北京大学与正大集团友好交往的直接参与者和历史见证人。采访结束临别分手时,我们与他于2018年新装修的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7号楼正门的外景合影留念。

这就是北京大学勺园群楼中由7号楼、8号楼、9号楼组成的“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的由来。

读书随笔

孩儿立志出乡关

·单伟 李春阳 李平

对大多数人来说,要形成清晰的自我认识和独立的人格,青春期是必须经历的一场“蜕变”。让我们一同回顾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少年岁月,从一代伟人的成长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庭,是家中长子,有两个弟弟。这个五口之家是典型的“严父慈母”家庭。父亲毛贻昌十七岁时接家中重担,先种地后当兵,偿还债务,从事经营,从贫农打拼成富农,性格中有固执易怒的一面。在毛泽东的叙述里,他“性情暴躁”“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得我困着”“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母亲文素勤则是位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在父子之间发生冲突时,文素勤多是站在儿子一边,并尽量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曾回忆说:“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于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她批评了任何公开动感情和公开反抗执政的企图,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毛泽东将母亲的保护看得“异常宝贵、值得珍视”,1919年,毛泽东母亲去世不久,他就写信给同学邹蕴真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人利己的,自己的母亲是属于第三种人。”

在父亲毛贻昌的规划里,毛泽东要先把田里的担子挑起来,等过两年再去学做买卖,由弟弟去田里接班,子承父业,他也可以安享晚年。在毛泽东十四岁那年,父母作主给他娶了罗氏为妻,希望以此拴住他的心。

但少年毛泽东却在书籍中,志在山河外。他最喜《岳飞传》《三国演义》等中国旧小说,田头陇上,饭前饭后,手不释卷。但父亲却觉得看书读了农活,他让毛泽东读书只因为“可以增加他赚钱的本领”,在他看来,其他的想法都是农家子弟的幻想。于是,父子间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不断地发展着。



毛泽东韶山冲故居

在这些“斗争”中,毛泽东自己总结出了一套“唱反调”的方法。他曾说:“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一

个同他辩论的有效的办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来驳他。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

这本书深受毛泽东的喜爱,并且激起了他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复学的想法依然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父子二人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毛泽东离家而去,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生家里又读了半年书。

在毛泽东与父亲发生的众多“战役”之中,有一场堪称是父子间最严重的争吵。有一次,毛贻昌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却当着他们的面骂毛泽东懒而无用。自尊受到伤害的毛泽东回击了父亲,跑出家门。毛贻昌非常生气,一边骂一边命令毛泽东回去。可毛泽东根本不听,他一口气跑到池塘边,恫吓说如果父亲再走近一步,他就要跳下去。最终,双方都提出了“停战”要求。毛贻昌坚持要毛泽东磕头认错。毛泽东则表示如果父亲答应不打他,他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毛泽东在少年时期的对抗、斗争,是他追寻他理想人生的轨迹,需要很大的勇气。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面对各种艰难困苦,他都表现出极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与他在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一步步走出了韶山冲,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壮志豪情,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大志向,投身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在几十年艰难而辉煌的斗争生涯中,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作出了光耀千秋的历史贡献。